

古代针织技术研究现状分析

石晶¹, 刘大玮², 葛梦嘉³

(1.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青海 德令哈 817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3.新疆大学 纺织与服装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以文物发掘报告为研究对象,以时间、地点为轴线,采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对织物组织结构进行分析。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古代针织技术研究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古代针织技术的研究现状,反映古代针织技术在现代针织技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为现代针织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多研究样本与理论依据,最后提出目前对于古代针织技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关键词:古代针织;针织历史;手工针织;研究综述;纺织技术

中图分类号:TS 1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033(2021)11-0022-04

Research Situation Analysis of Ancient Knitting Technology

Shi Jing¹, Liu Dawei², Ge Mengjia³

(1.Ethnic Museum of Haixi Mongolian and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Delingha, Qinghai 817000, China;

2.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3.School of Textiles and Gar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relic excavation repor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as the axis, and adopts the typology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fabric structur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earch data of ancient knitting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ncient knitting technology, reflects the important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knit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in the current knit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rovides more research sampl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knitting technology.

Key words:Ancient Knitting; Knitting History; Hand Knitting; Research Review; Textile Technology

关于我国针织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大多数人认为针织技术是洋务运动后传入我国的,因此早期文献注重实用效能,多为手工编织类书籍或针织机械操作类书籍,关于针织技术研究文献较少,直至建国后,相关研究才逐渐进展。但理论研究大多以西方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为基础,甚至并没有人对针织一词源流进行明确系统梳理,关于针织的定义也大多直接引用西

方文献,未进行深入探讨,导致在某些研究领域经常将针织技术与针织结构相混淆,没有明确概念。而针织物的创新设计研究,也是随近些年的市场需求,其研究成果才逐渐被学界所重视,至于针织史论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检索情况来看,在题目搜索中查询古代针织等关键词,检索文章仅10余篇,这些文章主要论述的焦点

在于古代针织技术存在合理性,认为棒针、钩针是针织所必需的编织工具,但事实并非如此。

本研究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于研究古代针织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根据这些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即针织物设计创新、针织机械研究、针织史论研究。本文属于针织史论研究范畴,以针织物组织结构及工艺研究为主。

基金项目:20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XKG007);2021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2021QKG001);2021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21KGYJ023);20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XJEDU2020SY003)。

作者简介:石晶(1974—),男,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唐代出土文物及针织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1 针织物出土实证资料分布

建国以来,全国范围内经考古发掘的不同时代墓葬数以万计^[1],关于线圈串套结构的古代织物出土数量众多,与现代针织结构相似。

目前最早关于线圈串套结构的古代织物实证可追溯至先秦,新疆哈密五堡出土浅驼色尖顶针织帽,其结构单元是环圈联编形式,经分析距今3 000多年^[2]。这种结构织物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多有出土。这些实证资料年代跨度为春秋早期至西汉晚期,多集中于新疆东部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古国遗址,如新疆鄯善苏巴什墓葬群、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墓地等,其数量及种类十分丰富,品种以首服居多,相关发掘简报对其编织方式、组织结构及特征均有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对这种织物技术形式称谓尚不统一。

在中原地区,关于这种织物组织结构的发现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长沙近郊墓葬进行首次发掘,发掘战国至唐宋墓葬160余座,值得注意的是一座编号406墓葬出土了一件网络丝织残片,此残片出土于棺内,为深褐色,背面附有黄褐色薄绢,并附有图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可查阅的最早关于线圈串套结构织物的记述。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整理,于1951年10月出版《长沙发掘报告》。

而对楚国墓葬较全面、较大规模发掘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约从1973年开始,不但楚国中心区域——湖北江陵地区楚墓发掘工作得到迅速开展,而且楚国其他要地及边远地区楚国墓葬发掘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北荆门郭家岗一号楚墓

等均出土线圈串套结构织物,其中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绦带保存完好,品类丰富,学界关注度高。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掘报告》。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秦汉时期相关织物的实证资料鲜有发现,直至近期才有新的突破。201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对江西南昌象山南路墓葬群出土的纺织品进行现场应急清理与保护,在编号M10王莽时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针织鞋,弥补了两汉时期该结构织物实证资料的空缺。

关于隋唐时期出土的实证资料也很少,仅见于青海都兰县热水血渭吐蕃墓葬群,该墓葬群属唐代早期墓葬,1982—1986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在一件红色罗底宝相花织锦绣袜连接处缝缀线圈串套结构绦带。

出土的宋元期间的线圈串套结构织物十分丰富。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对南宋赵伯澐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过程中,于墓主人足上清理出一双编织鞋^[3],其鞋面组织结构织造方式与同时期辽代出土的金属殓衣完全相同。

1960年,辽宁省新民巴图营子辽代墓葬出土网络殓衣,该殓衣主体由铜丝弯曲成圈,线圈相互串套。在随后考古发掘工作中,这种殓衣织造形式也多有发现,如内蒙古豪欠营子6号辽墓、河北隆化步古沟镇四里村辽墓等地墓葬发掘报告均有记述,这一时期线圈串套结构材料多为金属质地。其中以1985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殓衣保存最为完整,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观点认为这种织造形式可能来源于汉代。

1999年,河北隆化鸽子洞一处元代洞藏,出土各类元代文物160余件(套),其中包含两件线圈串套式结构殓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对这批纺织品进行清理与保护,两件殓衣研究成果发表于《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书中对殓衣基本情况及修复过程进行整理。比较发现,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棕色马尾环编菱格纹面罩^[4]与赵伯澐墓出土的编织鞋工艺、图案相似。

至明代,出土及传世织物也很丰富。出土的该类型纺织品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常州明代王洛家族墓等,该时期这种织物结构多附着于衬绢之上,发掘报告认为它们是刺绣技术的衍生,称之为环编绣。题材较以往也变得更加多样,其中传世作品多为佛教题材,一些实物大多已流传到海外西方藏品收藏家和鉴赏家手中,1995年中国香港艺术馆出版的《锦绣罗绮巧天工》一书中对此技术织物藏品有收录。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线圈串套结构织物考古发掘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其分布范围特别广,出土织物多集中于两湖流域、东部沿海及丝绸之路沿线;其次时间跨度特别长,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晚期^[5];最后实物样本特别丰富,织物品种涵盖首服、足衣、配饰等。出土的这些纺织品为我国针织史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

我国具有悠久的纺织服装历史,但关于针织技术的史论研究起步并不早,早期并未出现相关出土实物资料,随着我国纺织考古工作的开展,纺织考古实物资料逐渐丰富,学界才慢慢开始关注,尚未有学者对我国古代针织资料进行整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湖北江

陵马山一号出土线圈串套式结构织物的首次发现,学界对古代针织技术属性展开争论,有很多不同观点,为研究古代针织技术奠定坚实基础,古代针织技术的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2 古代针织技术研究现状

在实践研究方面,随着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等墓葬发现大量这种结构古代针织物,古代针织物实证逐渐丰富。沈从文、王亚蓉等在出土针织物实践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古代针织技术实证得以留存。在理论研究方面,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陈维稷的《中国纺织科技史》、黎国滋的《编织物及针织工业史料》等相继出版,皆以出土文物、传世古籍、遗存图像为依据,对我国古代针织技术特征进行研究,并通过对出土服饰文物的测绘,分析古代纺织技术特征。

其中,沈从文更重视古代服饰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书中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绦带称谓进行分析,介绍了几种绦带的不同编制方法^[6]。1984 年,陈维稷编写了《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书中结合历代出土实物资料,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我国古代编织的起源^[7]。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织物的类型及其组织元》等论文中,对我国古代手编织物进行归纳总结。他的研究以出土织物组织结构为依据,按组织结构将其分为斜编织物、绞编织物、环编织物。

21 世纪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王博等编纂的《扎滚鲁克纺织品珍宝》及赵丰编纂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成是贝锦》等,对新发现针织技术图像资料进行整

理。青岛大学马金燕在《中国早期手工编织的发展源流和技术分析》中以出土实物为样本,从技术角度,对汉代前古代编织技术进行分析,认为春秋时期是环编的成熟期。

除上述从历史实证与宏观发展演变的角度研究古代针织技术的文献,还有诸多学者着眼于对出土实物技术复原的研究。蒋玉秋的《明代环编绣獬豸胸背技术复原研究》、信晓瑜的《新疆出土早期帽冠初探》、查琳的《苏贝希三号墓地 M6 墓葬高尖帽复原研究》等论文,均通过文献与样本考据相结合的实证方法,从技术角度,对出土实证资料进行尺寸测量、结构复原等研究,得到很多宝贵数据与经验。

国外对其针织技术的历史研究时间较长,出土实物保存完好,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博物馆及研究机构均有古代针织技术藏品,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8 世纪末期。1783 年,一些匿名的业余艺术家和考古爱好者在《Gentleman's Magazine》第 6 刊上,围绕针织历史进行相关研究,共发表论文 11 篇,这些资料现收藏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中。而国外学者对于我国古代针织技术的历史研究则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1987 年,英国研究者瑞查德·瑞特所写的《手工针织历史》^[7],作者通过对 40 多个国家出土、传世古代针织物的考察,以时间为轴线,结合区位因素,详细记录整理针织物图案、组织结构及尺寸等,从文化、技术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古代针织技术的源流及传承关系。书中涉及东亚地区出土针织物的实证资料,特别是湖北江陵马山

一号出土针织绦带的织造技术。

1989 年,帕特丽·夏伯杰在《关于环编技术起源的思考》^[8]一文中,对 13—15 世纪东亚地区出现的一种针织结构绣片技术背景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用引线针进行编织的纺织工艺,从文化角度对这种纺织工艺起源进行探讨^[9]。

从以上关于古代针织技术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对古代针织技术的研究局限于对出土古代针织物的清理、保护等实践研究方面,对古代针织技术理论方面研究较少,与西方对针织技术的研究相比,我国古代针织技术理论研究属初级阶段,对古代针织技术并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判定标准,古代针织技术理论构架尚在建立之中。

3 楚地出土古代针织物研究现状

对于我国古代针织技术研究,楚地是我国中原地区埋藏时间久,也是较受关注的古代针织技术实证资料,许多学者对其绦带织物结构及技术特征发表了大量研究观点,而长久以来,对其绦带技术属性存在一定争议,以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为代表。

关于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相关研究最先出版于文物期刊 1982 年第 10 期,对墓葬发掘情况进行了简单描述。关于针织绦带相关研究,最早可见于 1984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中,认为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针织物考古实物是公元前 3 世纪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

198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掘报告》,报告由陈跃钧、彭浩编写,对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纺织品进行分析与梳理,客观描述出土绦带组织结构,并将这种带有线圈串套结构特征的绦带定名为针织

条。同年,彭浩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两种条带研究成果发表于《考古》期刊第1期,文章从组织结构,分析条带技术属性,认为把丝线弯曲成圈并串联起来而成的条带,属针织纬编织物,其观点基于现代针织纬编技术的定义。

而有一些专家及学者对针织条带的技术属性持不同观点。

赵丰在《马山一号楚墓所出条带的织法及其技术渊源》中从织物组织结构角度对条带织造技术进行推测,认为针织条带属孤证,与同墓出土的大量锁绣织品具有密切技术联系,条带织造技术应属刺绣技术衍生品,这篇文章于1989年发表在《考古》期刊第8版。

包铭新、陆锡莹与赵丰所持观点相近,但又综合了彭浩等人观点,他们把研究成果发表在1989年《中国纺织大学学报》第15卷第6期。认为针织条带织造技术应与同时期刺绣技术存在某种关联,但是此技术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它是介于手工针织物与刺绣之间的品种。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研究学者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针织条带织造技术属性也十分关注。瑞查德·瑞特在1987年出版的《手工针织历史》中认为,马山楚墓出土针织条带可能是一种近似针织结构的织物组织,支撑这一结论的原因为:首先关于马山楚墓出土针织条带数据较少;其次认为东亚没有针织技术历史,最早针织技术由西班牙人通过海上贸易传入东亚,最早追溯至17世纪末,至今日本、韩国等地区把袜子仍称为Meriyasu,它的词根来源于西班牙语Medias。

近期,邢媛菲在《西北美术》2016年第10期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针织条带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上述3种不同观点进

行了总结,从组织结构角度将针织条带与西方同时期留存下来的组织进行比较,并从文化角度对条带技术存在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与彭浩研究成果一致。

上述研究者结合其现有条件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针织条带技术属性进行考证,关于对其技术属性考证的重要性来源于对古代针织技术理论的建立,及古代针织技术对现代针织技术的影响,还基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针织条带出土年代的置前性、织物结构完整性及织物技术特殊性。发现以上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与实证相结合,值得借鉴。但是由于研究方向与实际条件的限制,对古代针织技术的研究多以组织结构为切入点,缺少对其物质性、功能性及文化属性的研究^[10]。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检索可见,我国古代针织物出土数量可观,出土实物多集中于战国时期两湖流域,并且由于这一区域特殊气候、地理环境,使针织物保存完好。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文献对战国时期两湖流域出土针织物发掘过程及外观结构多有描述,对针织物历史样貌进行呈现,在这一学术范畴内,部分研究者基于出土实证资料对古代针织技术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湖北荆州马山一号出土的线圈串套结构条带。但受研究方向及实际条件制约,这些研究多以织物外观结构为切入点,围绕对战国时期楚国存在针织技术合理性进行讨论,在研究过程采用很多研究方法,但仍缺少以下几方面讨论。

首先,关于针织技术特征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古代手工针织物与现代机械针织间的特征比较,现代针织技术由早期手工针织技术发

展而来,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同一性,同时还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不可避免的,是判断不同针织技术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判断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条带技术背景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次,关于条带研究以样本个体尺寸记录及结构描述为主,涉及组织结构规律分析较少,且从服效性能角度研究条带组织结构与楚国服饰文化关系的更少。对条带文化方面研究,往往多基于对其服装款式称谓历史溯源研究,通过对比文献考证其称谓,疏略于条带作用及在服装功能属性方面的研究。

最后,关于出土织物的艺术性研究较多,但是基于织物结构的设计创新实用性研究却很少。

参考文献

- [1]吴顺清,陈子繁,吴昊.古墓中出土纺织物的清理与保护研究[C]//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三次学术年会论文集.杭州: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三次学术年会,2004:159-177.
-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丝路考古珍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3]张亮.宋服之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
- [4]隆化民族博物馆.洞藏锦绣六百年(河北隆化鸽子洞洞藏元代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 [5]阿迪力·阿不力孜.新疆古代服饰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
- [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中国香港:商务出版社,1981.
- [7]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 [8]RICHARD R. A history of hand knitting[M].Coloeado:Interweave Press,1987.
- [9]赵丰.中国古代的手编织物[J].丝绸,1990(8):22.
- [10]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收稿日期 2021年5月2日